

民粹主义的三重逻辑 与现代突尼斯政治发展*

刘 辰 孙 丰 轩

内容提要 本文以民粹主义的三重逻辑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了突尼斯从法国殖民时期到当代政治转型中“人民”概念的争夺与建构。研究发现，突尼斯的民粹主义实践呈现出三个相互交织的逻辑维度：民族主义逻辑通过“殖民者与国民”的对立建构民族认同，从布尔吉巴时期的民族解放工具转化为独立后政治精英争夺权力的重要资本；民主欠发逻辑在“统治者与臣民”关系中体现为威权与民主之间的妥协形态，从布尔吉巴的魅力型领导到赛义德的威权回归，民粹主义始终扮演过渡性妥协的角色；宗教逻辑通过“世俗者与教民”的分化，展现世俗政权调用伊斯兰符号强化统治合法性，以及政治伊斯兰势力通过宗教民粹动员挑战世俗精英的双重进程。研究表明，突尼斯政治实践中的民粹主义具有显著工具性特征，不同政治力量通过争夺“人民”的话语定义权，建构集体认同和政治合法性。这种现象构成突尼斯政治变迁的隐性动力，也折射出非西方社会民主转型的复杂性。同时，民粹主义呈现出内在局限性：能够有效激发政治变革和进行情绪动员，却难以提供持续的治理方案。突尼斯案例展现了民粹主义的多样性、多源性和多向性特征，为理解非西方社会政治发展提供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新视角，并为当前全球民粹主义浪潮下的国际应对策略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 突尼斯 民粹主义 民族主义 民主转型 政治发展

作者简介 刘辰，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9）；孙丰轩，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9）。

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现象，更是一种政治逻辑。作为政治现象，民粹主义的经验源头可追溯至 19 世纪末的俄国和美国，历经三波浪潮后，已成为当今世

* 本文系 2023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区域与国别研究项目“民粹主义与阿拉伯国家政党政治研究”（项目编号：2023GQ017）的阶段性成果。

界政治图景的重要特征。它不仅在欧美国家显著崛起，也在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及东南亚等非西方地区广泛涌现。^① 作为政治逻辑，民粹主义聚焦于“人民”概念的生成及其向集体身份的升华，探讨“民”如何成为“粹”的过程。^② 因此，将具有不同社会基础、政治议程与策略多样化的民粹主义^③作为观察非西方社会的理论工具，既具有理论适切性，也具有实践必要性。

因处于地中海南岸的战略位置及法国长期殖民的历史，突尼斯政治发展进程深受欧洲影响，其民粹主义现象与欧洲民粹主义浪潮在触发机制和表现形式上存在一定共性。但是，突尼斯作为阿拉伯世界民主化转型的典型案例，其民粹主义实践又呈现出独特的本土特质。既有研究多集中于“茉莉花革命”后新自由主义结构下政党政治失灵与民粹主义的生成原因，^④ 或探讨凯斯·赛义德总统选举策略中的民粹因素。^⑤ 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将突尼斯民粹主义局限于政党政治语境，鲜少将其作为理论工具深入剖析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实际上，民粹主义的人民生成逻辑贯穿突尼斯现代政治发展历程，串联起民族主义、民主化与伊斯兰主义等多元思潮，为理解非西方社会的政治变迁提供了独特视角。

本文聚焦民粹主义如何通过塑造“人民”概念来生成突尼斯的集体身份，探讨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及宗教势力如何利用民粹主义逻辑“争夺”人民，以及伊斯兰教如何成为不同行动者强化民众动员的催化剂。基于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民主及伊斯兰教的互动关系，本文构建了三重逻辑分析框架，重新审视突尼斯政治发展历程，以期为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思路。

- ① 林红：《威权、福利与庇护：民粹主义在非西方世界的激荡之旅》，《世界政治研究》2020 年第 2 辑，第 93—121 页。
- ② [美] 弗朗西斯·福山：《新身份政治》，吴万伟、罗亮译，《国外理论动态》2019 年第 7 期，第 56 页。
- ③ Vedi R. Hadiz and Angelos Chrysogelos, “Populism in World Politics: A Comparative Cross – Region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8, No. 4, 2017, p. 399.
- ④ 参见易小明：《突尼斯左翼政党分裂根源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 年第 4 期，第 147—150 页；Carmen Fulco and Mattia Giampaolo, “The Neoliberal Cage: Alternative Analysis of the Rise of Populist Tunisia,”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 32, No. 1, 2023, pp. 27 – 52；Daniela Huber and Barbara Pisciotta, “From Democracy to Hybrid Regime: Democratic Backsliding and Populism in Hungary and Tunisia,”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 29, No. 3, 2023, pp. 357 – 378.
- ⑤ Fethi Helal, “‘The People Want...’: the Populist Specter in the Tunisian President’s Inaugural Speech,”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Vol. 19, No. 3, 2022, pp. 233 – 251；Alessia Melcangi, “Tunisia: The Populist Drift of Saied and the Looming Socioeconomic Crisis,” Atlantic Council, 2022 – 10 – 07,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tunisia-the-populist-drift-of-saied-and-the-looming-socioeconomic-crisis/>, accessed June 25, 2024；Claudia Annovi, “Exploring Conspiracist Populism in Power: The Case of Kais Saied in Tunisia,” *Genealogy*, Vol. 8 No. 43, 2024.

作为一种政治发展逻辑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作为一个复杂概念，学界对其定义尚未达成共识，相关研究涵盖意识形态、政治策略、政治话语及社会运动等多重维度。^① 这种概念的多样性源于民粹主义自身具有的不确定性、历史动态性及背景差异性。^② 不确定性使其能与多种意识形态结合，成为“变色龙”^③ 和“政治涂料”^④；历史动态性体现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内涵与表征变迁；背景差异性则导致不同区域的民粹主义在共同特质之外呈现出理论与实践的特殊性。尽管如此，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仍然围绕一种特定的政治逻辑展开：通过构建“人民”与“精英”的二元对立，重构权力关系、激发政治动员，并以此影响权力配置。

作为政治逻辑，民粹主义的核心在于“人民”概念的生成与升华。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率先提出民粹主义的政治逻辑视角，认为人民是民粹者构建符号权力、统合社会需求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通过强化对抗性逻辑实现政治动员。^⑤ 广受关注的“穆德命题”进一步指出，民粹主义逻辑以道德为基础构建二分法，将人民与精英设定为善恶对立，人民被视为纯洁真实的群体，其道德性源于集体利益和共同意志；精英则被描述为腐败且脱离群众、漠视人民利益的群体。^⑥ 因此，民粹主义并非单纯的反体制现象，而是在争夺对“人民”定义权的过程中，动态塑造政治主体与权力格局的机制。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经常同时出现，但二者本质不同。部分研究欧洲政治的学者将民粹主义等同于极右翼民族主义，认为其以排外叙事为核心动员工具。^⑦ 然而，此路径在解释拉美等地区的左翼民粹主义时显得过于单一，包容性民族主义逻辑难以被涵盖。随后，学界对二者的区别逐渐明晰：民族主义沿“内外”对立轴区分“民族共同体”与“他者”，民粹主义沿“上下”对立轴构建“人

① 何涛：《民粹主义是一种薄意识形态吗？——对穆德命题的反思与批评》，《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2期，第138—147页。

② 郎友兴、吕鸿强：《民粹主义：概念界定方法之比较》，《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4期，第38—53页。

③ [英] 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④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88—96页。

⑤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Verso, 2005, pp. 85, 96.

⑥ Cas Mudde, “Populism: An Ideational Approach,” in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pu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52.

⑦ A. Stewart, “The Social Roots,” in G. Ionescu and E. Gellner (eds.), *Populism: Its Meaning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69, pp. 180 – 195.

民”与“精英”的对立。^①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精英借助跨国文化和资本巩固地位，从新自由主义中获利，推动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不平等与身份危机的根源。这使得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反对对象趋于合流，反对“他者”的民族主义逻辑亦成为民粹主义的重要维度。

民粹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焦点议题。欧美国家右翼民粹的崛起常被视为民主衰退的结果与表现，源于对“民主赤字”的不满。代议制民主在回应民众需求方面的失效——如经济不平等加剧、政治腐败蔓延及精英政治封闭性——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动员基础。^②民粹主义者通过人民与精英的对立叙事，以“重塑人民主权”为名进行动员，试图填补民主制度的功能性缺口。在这一过程中，民粹主义者常通过削弱制衡机制、集中权力来兑现“效率”与“清除腐败”的承诺，从而逐步走向威权化。^③而在民主发育不充分的情境下，制度建设薄弱、权力分立不健全和法律体系不完善的国家，容易在民粹主义煽动下走向集中化统治。^④尽管初始条件不同，民主衰退中的民粹主义表现为对既有制度的功能性替代，而民主欠发中的民粹主义则表现为对脆弱民主制度的进一步扭曲，二者最终均指向权力集中与多元主义削弱，体现民粹主义逻辑与民主逻辑的复杂张力。

民粹主义与宗教存在显著关联，宗教通过“信徒”和“异教徒”划分“教民”与“他者”，为民粹主义提供道德对立的依据，并将世俗不满转化为宗教仇恨。其建构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政治神圣化，即赋予政治以宗教意义，将其视为超越世俗的神圣事业，执政者被塑造为纯洁信徒，代行神意“治理天下”；宗教政治化，即利用宗教教义、神圣文本或传统为政治主张提供合法性，将政治斗争塑造为宗教使命。^⑤在伊斯兰教背景下，宗教民粹主义尤为突出。例如，1979 年伊朗革命中，什叶派教义被政治化，霍梅尼将“受压迫者”与“世俗精英”对立，强调通过宗教革命实现社会正义。^⑥全球“圣战”运动也被解读为“宗教民

① R. Brubaker, “Populism and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6, No. 1, 2020, pp. 44 – 66.

② A. Nurdin, A. I. Setiawan, and A. R. Nugraha, “The Rise of Populism and Its Impact o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lobal Tren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and Human*, Vol. 1, No. 2, 2024, pp. 67 – 77.

③ 吴鑫：《批判视域中的威权民粹主义》，《湖北社会科学》2024 年第 7 期，第 47—58 页。

④ 林红：《威权、福利与庇护：民粹主义在非西方世界的激荡之旅》，第 93—121 页。

⑤ José Pedro Zúquete, “Populism and Religion,” in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pulism*, pp. 566 – 567.

⑥ Dani Filc, “Populism in the Middle East,” in Carlos de la Torre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Global Populism*, Routledge, 2019, pp. 386 – 387.

粹主义”，其叙事将伊斯兰共同体（乌玛）定位为被“无信者”^①压迫的受害者，号召通过“圣战”恢复神圣秩序。^②在现代伊斯兰国家，如埃及、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新伊斯兰民粹主义”通过团结边缘化群体，以乌玛代表“人民”，挑战不公秩序，有时甚至通过民主途径进行动员。

殖民者与国民：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逻辑

在突尼斯政治发展历程中，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构成了一条清晰的逻辑主线。从法国殖民时期的反抗斗争，到独立后的国家建构，再到“茉莉花革命”后的政治转型，民族主义始终为民粹主义提供核心动员资源，而民粹主义则通过人民与精英的二元对立叙事，强化民族认同的政治动员力。这种逻辑不仅塑造了突尼斯现代政治的基本格局，也为理解非西方社会民粹主义的本土化实践提供了重要案例。

（一）从解放工具到政治资本

在突尼斯，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逻辑源于殖民背景下的社会双重分化：一是族群分化，表现为殖民者对本土民众在资源与权利上的剥夺，以及二者文化价值的激烈冲突；二是阶级分化，外源现代化带来的财富红利被本土精英独占，底层民众则承受着税收负担并面临社会动荡，形成显著的利益对立。这两种分化机制相似，均体现了现代化转型与外来文化冲击下，原生社会对尊严、财富与权力问题不满的集体表达。^③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的“民”与民粹主义的“民”均指特定环境中具有共同族源与相似遭遇的广大民众。民粹主义通过叙事建构，将被压迫的民众转变为拥有主权意识的人民，声称为其代言，从而为民族主义注入强大的动员力量。^④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的核心在于对“人民”的双重定义：一方面，人民被道德化为正义和纯洁的象征，与殖民者及本土精英形成对立；另一方面，人民被具象化为包括工人、农民和女性等在内的广泛群体，通过跨阶级、跨族群的政治联合实现动员。这种逻辑展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特征：对外通过反殖民叙事排

① 包括西方文化、世俗国家及其统治精英等。

② Vedi R. Hadiz, *Islamic Populism in Indonesia and The Middle E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5 – 18.

③ [黎巴嫩] 阿卜杜勒·哈迪·法基吉：《民粹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文），贝鲁特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7页。

④ Margaret Canovan, *The People, Polity*, 2005, p. 2.

斥外来文化与资本，以完成去殖民化进程或赢得民族主义选民支持；对内通过文化和身份认同划分“真正的突尼斯人”与异质群体，强化本土主义情绪与排外倾向。这种逻辑既为民族主义提供动员力量，也可能加剧社会分裂。在突尼斯政治实践中，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表现为两条路径：一是历史上通过推翻殖民统治获得国家主权；二是在现代政治中渗入政党政治，通过选举获取权力。这种合流已成为突尼斯政治力量获取和权力延续的重要策略。

（二）去殖民化时期民族主义的民粹面向

1881 年，突尼斯沦为法国保护国，本土统治者在殖民者支持下推行政治改革，高举“民主”“平等”“自由”旗帜，颁布宪法，尝试建立宪政国家及现代化的教育和军队体系。然而，这种带有殖民与封建双重色彩的新政不仅未能构建有效的民族与国家认同，反而进一步加剧社会分化。首先是突尼斯人与外来者的尖锐对立。19 世纪末来自宗主国的移民持续涌入，并享有政治与经济特权，严重挤占本土民众的生存空间，同时基督教异质文化对本土伊斯兰传统造成强烈冲击，激发广泛的排外情绪。其次是社会内部分化，上层精英从现代化红利中获得财富和权力，而下层民众则陷入税负增加、民生恶化和社会动荡的困境，从而导致传统与现代、本族与外族、底层与上层的多重矛盾，引发民众对社会不公的普遍不满。这种割裂使底层人群与边缘人群产生广泛联系，“人民话语”被赋予多重维度，为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注入反殖民与反封建的双重内核。^①

20 世纪初，青年突尼斯人运动成为民族主义实践的萌芽，其成员多为接受欧洲自由主义与现代主义思想的中产精英，既深受西式教育影响，又对穆斯林身份和本土文化具有根本认同。该运动以“为人民代言”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主张在保护国架构内进行改革，要求突尼斯人拥有自决权，积极推行公共教育和农业改革，努力融合现代主义与传统价值观。1920 年，部分成员组建宪政党，要求殖民者保障突尼斯人与法国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并提出制宪诉求。然而，青年突尼斯人运动和宪政党在推动突尼斯民族意识觉醒的同时，均未能有效弥合前述两种社会分化，反而加剧殖民者对本土民众的警惕和排斥。

作为中产精英组织，这两个团体未能有效团结底层民众、开展广泛的基层动员，也不愿以本阶级利益为代价换取更广大底层人民的根本利益。其西化思想不仅没能构建全新的国家认同，反而因与本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加剧各阶级间隔阂。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以为人民利益和民族权利代言为口号，

① [美] 罗杰斯·布鲁贝克：《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禾泽译，《国外理论动态》2020 年第 5 期，第 117 页。

但均未提出明确的民族独立目标，而是致力于在维护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渐进式改良。这种以改良者身份维护既有体制，而非以革命者身份反抗现存建制的政治实践，无法有效激发和凝聚突尼斯人的民族独立热情和自觉意识，难以有力抗击殖民统治带来的压迫与不公。同时，这种中庸主义的、带有妥协性质的民族认同建构方式也未能汲取民粹主义所蕴含的强大非理性动员力量，无法将民众的不满情绪有效转化为政治资源，难以形成对现行体制的有力冲击和彻底改造。

1932年，布尔吉巴创办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行动报》，1934年创建新宪政党并担任总书记。受同时期法国人民阵线的启发，布尔吉巴认识到团结边缘群体和建立广泛社会联盟的重要性。因此，新宪政党摒弃了旧宪政党的精英主义色彩，转而采取具有强烈民粹特征的全民动员政策，通过建立社会小组迅速发动群众，并深入渗透旧宪政党势力薄弱的乡村地区，积极领导示威游行和民众抗议活动。二战后，新宪政党进一步强化其全民政党形象，向下积极接触突尼斯工人总联盟，不断强化基层民众凝聚力；向上将中产阶级纳入动员范围，建立更广泛的跨阶级联盟。此外，新宪政党的动员对象扩大到女性和犹太人群体，主张为女性提供参与公共领域事务的机会，并在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时大力宣扬“犹太人是我们的兄弟”，强调两个群体共有的突尼斯人身份认同，形成反抗殖民政府的合力。^① 值得注意的是，布尔吉巴在动员民众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中，虽然指出实现整个阿拉伯民族的自由与复兴是其终极目标，但更加务实地强调领导突尼斯人民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发展的优先地位。这不仅使动员对象的概念与身份特征更加具像化、明晰化，激发了本国人民对自身国族身份的强烈认同，推动民族主义关注的族群地位与民粹主义主张的阶级权益实现高度融合，也避免突尼斯被当时地区盛行的纳赛尔主义等思潮裹挟卷入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洪流，使其能够把握独立自主探索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机遇。^②

布尔吉巴制定了清晰的斗争计划，其中将新宪政党描绘为“源自人民、忠于人民的平民政党”^③，提出“获取和要求”政策，强调社会公正原则和社会平权，主张终结封建王室统治，还权于民。同时，他将民粹思想中的排外主义、本土主义注入民族主义话语，使之受到非理性因素的渲染和催化，成功发动工人进行大规模罢工，动员民众诉诸暴力，反抗法国殖民和压迫。大量工农和学生在其号召

① [阿尔及利亚] 波斯沃尔夫·科埃德：《1920—1956年突尼斯民族运动中的独立思潮》（阿拉伯文），穆罕默德·布迪亚夫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第28页。

② 李竞强：《突尼斯政党政治与民主化改革》，《中东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第67页。

③ Lars Rudebeck, *Party and People: A Study of Political Change in Tunisia*, C. Hurst & Company, 1969, p. 83.

下发放革命传单、炸毁铁路、切断通信、袭击法国军警、焚烧殖民者庄园。由此，具有爱国色彩的民粹主义催生出走向暴力的极端民族主义，^① 布尔吉巴也成功构建起正义的“我们”和非正义的“他们”之间的二元对立叙事，最终引领占据社会绝大多数和道德制高点的普通民众推翻内部封建统治者和外部西方殖民者所建立的暴政，并赋予自身政权充分的道德性与感召力。^②

在反殖民斗争、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有效强化了突尼斯民众的民族认同，赋予广大底层民众以民族共同体属性，并强调本民族具有的正义性与道德性。这种结合在团结民众对外抗击殖民侵略、对内推翻封建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突尼斯人界定身份、弘扬传统、塑造共识的主要推动力。^③ 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共同推动的政治洪流中，新宪政党成功夺取政权，开启国家现代化进程。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成功引领了民族革命，推翻了旧精英统治，确立了新的政治权威，虽然转变为布尔吉巴及其后继者本·阿里维护稳定的主要工具，但在实现个体、民族、国家三大要素融合统一上发挥了积极作用。^④ 然而，随着本·阿里时期威权体制的不断僵化和民主化浪潮的冲击，突尼斯政坛涌现出多个政党，特别是部分左翼政党，它们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中重新汲取能量，构建起反专制、反建制、反精英的政治话语，成为引发突尼斯政治剧变的重要因素，也在剧变后通过不断分化组合，成为突尼斯重要的政治压力集团。^⑤

（三）剧变后左翼民族主义党派的民粹策略

“茉莉花革命”后，突尼斯多个政党经历分裂和重组，“统一民主爱国党”与多个反对党组成“左翼人民阵线”，“呼声党”与“共和党”等党派组成“保卫突尼斯联盟”，积极参加议会和总统选举，凭借极具民粹特征的宣传策略，不断扩大政治影响力。这些左翼政党的民粹策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力宣扬民族主义价值回归的必要性，主张重构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基于本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模式来实现民族经济复兴，化解社会分歧矛盾；另一方面，强调人民主权的神圣性，构建跨阶级、跨族群的身份认同，

①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第 95 页。

② 刘辰：《民粹主义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国际论坛》2022 年第 5 期，第 135 页。

③ [突尼斯] 萨利姆·拉比德：《身份认同：伊斯兰、阿拉伯民族主义与突尼斯化》（阿拉伯文），黎巴嫩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 2009 年版，第 107 页。

④ [巴勒斯坦] 阿兹米·比萨拉：《民主转型及其问题：理论与应用的比较研究》（阿拉伯文），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 2020 年 7 月，第 326 页。

⑤ 易小明：《转型时期的突尼斯政党政治：左翼政党透视》，《西亚非洲》2017 年第 2 期，第 89 页。

吸引和扩大底层民众的政治参与，这成为此类政党在突尼斯迅速崛起的关键因素。

以2012年成立的人民阵线为例，该政党自我定位为“希望、劳动、斗争与烈士之阵线”，强调开辟第三条道路，以人民为中心、捍卫全体民众根本利益的斗争纲领，突出其政治结构的多元性和广泛性。同时，该阵线主张维护本民族的纯洁性和独立性，坚决抵制犹太复国主义对阿拉伯人民领土的侵占，反对加入以美国、北约等为代表的“联盟、轴心或半轴心组织”。^①例如，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突尼斯提供2.9亿美元贷款，用以支持该国经济改革计划。然而，这一贷款协议附带削减公共开支、减少补贴和推进私有化改革等条件，在突尼斯国内引发广泛争议。人民阵线坚决反对此协议，认为这是国际资本对突尼斯经济的进一步控制，将加剧社会不平等，削弱国家对关键经济部门的控制。他们提出，经济主权是国家独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将重蹈殖民经济依附的覆辙。又比如，突尼斯的磷酸盐储量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但这一行业长期受跨国企业主导，大部分收益被外国公司攫取，却给当地社区留下环境污染和就业不足的问题。人民阵线呼吁对这一行业进行全面国有化，确保资源收益直接惠及突尼斯人民。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结合往往体现了精英阶层的自觉设计。^②突尼斯民族主义精英在政党活动中着力树立平民政党形象，利用人民和民族概念的正义性和道德性赋予自身政治话语合法性。尽管剧变后具有民粹特征的诸多左翼政党在突尼斯政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并成功吸引众多受欧洲民粹思想影响的青年人以及试图重塑阿拉伯民族主义辉煌的政治团体加入，然而这种民粹民族主义策略存在明显局限。首先，民粹主义逻辑无法提供有效的政治改革方案和明确的经济发​​展纲领，无法处理好国家稳定与发展间关系，因此只能聚焦于煽动革命；只关注利用民众怨恨情绪实现颠覆与破坏，无力进行国家建设和治理优化，使国家在剧变后陷入循环往复的政治危机。其次，政党间高频的分化重组，政党领导人因利益驱动而多次转换阵营的行为，使糅合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的政治话语彻底成为少数精英激化政党论争、谋求私利的意识形态工具，更多地是为各党派赚取政治资本服务，而没有成为团结底层民众，有效表达权利诉求的平台与渠道。

① 《突尼斯人民阵线：左翼反对联盟》（阿拉伯文），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018年1月11日，<https://www.aljazeera.net/encyclopedia/2018/1/11/الجهة-الشعبية-بتونس-ائتلاف-پساري>，accessed July 28, 2024。

② 林红：《当代民粹主义思潮的孕育、生成与有效应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7期，第56页。

更令人担忧的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再度合流助长了种族歧视、排外思想和仇外心理的蔓延。多个政治力量针对撒哈拉以南地区移民数量激增问题发表种族主义言论，大肆宣扬非洲移民正在改变突尼斯人口结构和身份认同。在经济发展低迷、政治危机频发背景下，这种排外论调进一步削弱突尼斯各族群的社会凝聚力，加剧少数族裔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进而可能引发长期的政治对抗、文化隔阂乃至暴力冲突。^①

统治者与臣民：民粹的民主欠发逻辑

在突尼斯的政治发展历程中，民主制度发育不良为民粹主义提供了独特的生存土壤。从独立后的威权统治到“茉莉花革命”后的民主实验，再到当前的威权回归，突尼斯始终徘徊在民主与威权之间的灰色地带。这种民主欠发状态使民粹主义成为连接统治者与民众的重要纽带，既为威权统治披上民主外衣，又为强人政治提供合法性基础。通过分析突尼斯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出民粹主义如何在民主基础薄弱的环境中发挥桥梁作用，成为威权与民主之间的一种妥协性政治逻辑。

（一）威权向民妥协和必然状态

突尼斯独立后即开启民主化进程，但受历史文化与政治禀赋等因素影响，其民主发展呈现出一种发育不良甚至畸形的状态，表现为身披民主外衣，扮演早期民主监护者角色^②的威权政治模式。这种状态与欧美国家民主衰退后的威权化趋势相似，都是在民主基础受损的情况下，寻求对制度缺口的功能性补足。俞可平曾指出，民粹主义“有着民主的内涵，但最终极有可能走向专制独裁”^③，这一论断实际上揭示了民粹主义作为民主和威权之间桥梁的特殊角色。在民主欠发环境中，当民众对无法正常运转的民主制度及其背后的政治精英失望情绪加剧时，民粹主义便借机批判传统精英和现有制度，宣称直接代表人民意志。同时，发达国家面临的困境与实力相对萎缩，也昭示自由民主背后弱政府范式的衰落和强政府范式的回归。^④

民主衰退和民主欠发构成了通向民粹主义的两条不同路径，但二者采用的方

① 刘辰：《民粹主义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第 134 页。

② 王猛：《阿拉伯国家剧变与“威权政治”》，《现代国际关系》2011 年第 7 期，第 39 页。

③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第 95 页。

④ 倪春纳：《自由民主的全球衰退及其根源》，《江海学刊》2019 年第 1 期，第 127—136 页。

法都是权力集中化与直接化，即学术文献中常提及的反建制逻辑。这种逻辑主要通过两种具体操作方式体现：首先，在权力获取阶段，通过反建制叙事强调领导者与大众之间的直接联系，削弱代议制机构的重要性，将人民团结在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周围，形成突破现状的合力；^① 其次，在权力巩固阶段，以简化治理为名，宣扬效率和秩序价值，强化行政权力，同时削弱立法和司法的独立性。^② 这两种模式在突尼斯政治发展的三个阶段均有体现：独立后的国家建构进程、“茉莉花革命”后的政党政治竞争，以及当前凯斯·赛义德总统的治理策略。突尼斯案例表明，在民主基础薄弱的社会中，民粹主义常成为威权与民主之间的一种过渡性妥协，既借用民主话语获取合法性，又通过威权手段维持统治效能，形成一种特殊的政治发展逻辑。

（二）剧变前国家建构的民粹面向

布尔吉巴执政时期，基于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的成果和法国殖民者的政治遗产，突尼斯建立了一套兼具民主形式和威权特点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是民族民粹主义的权威领袖在后民族革命时期面临民主诉求压力时，向代议制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妥协产物。它既为领袖强化威权统治根基披上了民主外衣，又利用民粹因素不断加固民众对于魅力领袖的信任感与忠诚度。在这种体制下，行政权力超越立法和司法，权力高度集中于总统个人。布尔吉巴将“民族解放领袖”和“国父”的身份与威权统治相结合，通过民粹主义逻辑巩固权力，满足民众诉求并塑造国家认同。

布尔吉巴运用民粹主义巩固权力的策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领袖形象的神化。建国后，他借助自己在民族独立斗争中的地位，通过广泛宣传将自己塑造成突尼斯的“最高斗士”和“国父”。这种领袖形象不仅满足民众对国家强有力领导者的期待，还借助宗教性词汇和民族主义话语强化其道德权威。例如，在布尔吉巴的官方肖像中，他以“父亲般的姿态出现”，手持宪法，象征其带领国家迈向未来的决心。^③ 这种领袖形象深刻嵌入突尼斯政治文化，成为政府合法性的核心象征。

其次是民众中心主义的政治话语。布尔吉巴提出人道自由主义理论，强调普

①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The Ambivalence of Populism: Threat and Corrective for Democracy,” *Democratization*, Vol. 19, No. 2, 2012, pp. 184 – 208.

② Margaret Canovan,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XLVII, 1999, pp. 2 – 16.

③ D. Hopwood and S. M. Terry, *Habib Bourguiba of Tunisia: the Tragedy of Longevity*, Springer, 2016, p. 82.

通民众的中心地位。他主张以提升底层民众社会经济地位为国家发展的核心任务，尤其关注妇女权利、教育和社会正义，坚信“广大民众的努力和智慧可以让国家战胜不发达的难题”^①。这种政策话语体现了民粹主义逻辑，将国家进步与底层民众的努力直接挂钩，将民众的个体提升等同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从而实现以民为粹，将广大民众置于国家发展和政权稳定的中心地带。^②

最后是制度设计中的道德权威中心化。布尔吉巴将总统权力写入宪法，强调领导者个人品质和能力是国家发展的根本。这种以道德权威为中心的制度设计强化了领袖与民众的直接关系，同时削弱了代议制的实际作用。他对新宪政党的组织结构进行改革，放宽入党条件，积极吸纳民众入党，广泛设立基层组织，加强中央控制，使新宪政党成为与国家组织机构交叉与重叠的权力主体。布尔吉巴作为政党领袖独揽国家大权，依托基层组织，通过内嵌于国家机关内部的党组织来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控制。^③ 这一治理模式通过民粹主义话语实现了威权主义制度化，巩固了布尔吉巴的个人权威。在经济政策层面，布尔吉巴借助民族主义情绪推行一系列具有民粹主义特征的政策，如没收殖民者土地并重新分配，推行突尼斯化政策等，将经济机会优先分配给本国民众。这些政策在短期内有效满足了底层民众的需求，同时通过国有化和公共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这种通过公共支出和国家控制建立的社会契约难以确保经济可持续性。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布尔吉巴的政策逐渐显现局限性。伴随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加剧，民众对其个人权威的崇拜转变为对政治僵化和社会不公的愤怒。1984 年，因面包价格上涨爆发全国性骚乱，以及随后的旅游业衰退和失业率攀升，标志着布尔吉巴政权合法性的全面削弱。这种“从魅力领袖到腐朽精英的转变”^④，体现了民粹主义治理模式无法避免的危机。布尔吉巴的登场与退场都遵循相似的民粹逻辑：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导致社会不满群体增加，社会认同撕裂，新势力或新领袖借底层民众之力获得更广泛的代表性，从而向现有制度发起挑战。80 年代中后期，布尔吉巴试图进一步强化终身总统地位，其“国家即我”的言论和利用媒体贬低其他政治对手的行为，引发执政党内部精英对其信任的加速崩塌，党内相继推出党内事务民主化、限制滥用专制权力的改革方案，呼吁建

① Vandewalle D. Bourguiba, “Charismatic Leadership and the Tunisian One – Party System,”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34, No. 2, 1980, p. 151.

② 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6 页。

③ 张建伟：《民主与威权的政党起源：一个替代性理论框架》，《天府新论》2015 年第 5 期，第 105 页。

④ [巴勒斯坦] 阿兹米·比沙拉：《光荣的突尼斯革命：通过日记了解革命的过程与结果》（阿拉伯文），卡塔尔阿拉伯政策与研究中心 2012 年版，第 56 页。

立多党制并限制总统对继承者的任命权。

1987年，本·阿里通过政变推翻布尔吉巴。这次政权更迭的特殊之处在于，本·阿里并非弱势社会群体的代表，也不是冲垮布尔吉巴政权的社会运动领导者，而是布尔吉巴亲自任命的总理，是1978年镇压工人罢工和暴乱的直接负责人。夺权后，他并不具备布尔吉巴作为民族英雄的身份，也无法凭借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独立的政治遗产立即获得执政合法性。^① 他刻意淡化政变性质，宣称布尔吉巴的健康状况危害了国家利益，并以恢复秩序为名获得广泛支持。^② 同时，本·阿里在执政初期将宪政、民主、开放标榜为自身的执政理念，通过建立多党制、取消终身总统制等方式承诺向社会开放参政渠道，以实现民众和各势力对政治多元化的诉求。他利用媒体和知识分子着力打造和宣传自身“不知疲倦的改革者”“伟大奇迹的创造者”“法律和制度的捍卫者”^③ 的英雄形象。

然而，本·阿里的民主改革承诺长期未能兑现。突尼斯政治发展反而走向国家权力极度垄断于统治家族手中的方向，对威权领袖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形同虚设，统治阶层腐败滋生，权力寻租现象严重，上层精英对底层民众的巧取豪夺加剧。同时，光鲜的经济发展数据背后，是社会阶层间物质财富鸿沟拉大、国民收入分配极不平等、青年失业率持续攀升的现实。经济自由化与市场化未能让广大底层民众真正受益，反而将其推向更残酷的不平等与边缘化境地。在资本俘获政党、家族绑架国家的过程中，本·阿里不再是为国家自由、民主、福祉奋斗的英雄与改革者，而成为陷入群众性信任危机、平民代表性断裂的表演型政客。^④ 与虚假的民主政治和经济繁荣相伴而生的，恰恰是曾推动上一轮政权更迭并维护本·阿里权力基础的民粹情绪。随着内外势力合流和网络工具串联，以“要面包和水，不要本·阿里”^⑤ 为口号的民众起义和暴力抗争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主张消灭特权、颠覆不公制度的民粹主义，从塑造领袖魅力和宣传制度优越性的工具再度转变为引领平民暴力革命的武器，使广大民众对现有制度的普遍怨恨不断发酵，最终成为引发国家政治社会剧变的颠覆性力量。

① [毛里塔尼亚] 赛义德·瓦莱德·阿巴：《新阿拉伯革命：进程和命运》（阿拉伯文），黎巴嫩贾德瓦尔出版发行公司2011年版，第13—14页。

② [英] 肯尼斯·帕金斯：《突尼斯史》，姜恒昆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182页。

③ [突尼斯] 安瓦尔·贾姆阿维：《关于突尼斯的制度精英》（阿拉伯文），新阿拉伯人网，2023年8月18日，<https://www.alaraby.co.uk/opinion/عن-النخب-النظامية-في-تونس>，accessed July 12, 2024。

④ 张飞岸：《身份政治与自由主义危机——从西方政治思潮变迁的视角分析》，《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5期，第152页。

⑤ [卡塔尔] 穆罕默德·穆赫塔尔：《离开的本·阿里，崩塌的样板》（阿拉伯文），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011年1月14日，<https://www.aljazeera.net/news/2011/1/14/رحيل-بن-علي-سقوط-نموذج>，accessed January 15, 2025。

(三) 联合政府时期政党政治中的选民策略

2010 年剧变爆发后，突尼斯政治格局进入前所未有的重塑阶段，各政治势力纷纷登上政治舞台。经过长期斗争与妥协，国家一度建立起由世俗主义政党和伊斯兰政党共同执政的联合政府。这一时期的政党政治呈现出显著的民粹主义选民策略特征，体现在政党竞争、联合执政和政策制定等多个层面。

联合政府的形成经历了曲折过程。2011 年，突尼斯举行第一次制宪议会选举，伊斯兰复兴运动凭借其在宗教和社会事务领域的长期积累，一举获得制宪议会 217 席中的 89 席，成为第一大党，并主导制宪工作。^① 2014 年，经过长时间协商与争论，制宪议会通过新宪法，确立世俗制与共和制框架，明确总统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并在新宪法指导下进行议会选举。^② 同年，议会选举正式举行，标志着突尼斯进入新宪法指导下的民主体制。在“茉莉花革命”后的近十年间，复兴运动与世俗主义政党呼声党组建联合政府，试图通过政治合作缓解意识形态分歧，凝聚政治共识，共同推动国家重建。尽管联合政府通过新宪法制定、直接选举等民主程序，在形式上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民主框架，但是政治共识却多次濒临破裂。在全国对话机制下，两党达成权力共享的妥协，呼声党同意继续与复兴运动合作，但是强调在经济政策上保持一定独立性。这种妥协反映了突尼斯政党政治的民粹逻辑，即通过人民利益话语争取政治协商，但本质上只是短期权力平衡的结果。

在复兴运动和呼声党执政期间，各党派试图通过短期政策红利来缓解社会分配不均、经济焦虑与底层贫困问题，以此获取选民支持。例如，呼声党党魁埃塞卜西提出的 2016—2020 经济复苏计划，目标包括发展区域经济、加强地方治理、改善基础设施以及推动权力下放。^③ 这些政策表面上顺应民众的经济诉求，但事实上，民粹主义逻辑驱动下的执政者往往优先迎合选民情绪，而忽视政策的可持续性。这种策略曾出现于布尔吉巴与本·阿里时期，政府通过扩大外债、增加福利承诺等方式试图赢得支持，却因忽视通货膨胀与财政赤字等经济风险，最终政策失败，激化了社会不满。

复兴运动与呼声党的合作始终充满张力，双方的党争过程同样体现出民粹主

① “Tuni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 2011 General,”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lectoral Systems, 2011 - 10 - 23, <https://www.electionguide.org/elections/id/1608/>, accessed January 18, 2025.

② 《突尼斯制宪会议通过新宪法所有条款》（阿拉伯语），France24, 2014 - 1 - 24, <https://www.france24.com/ar/20140123-تونس-البرلمان-مصادقة-دستور-إسلاميون-علمانيون-تكفير>, accessed January 19, 2025.

③ 《突尼斯发展计划 2016—2020》（阿拉伯语），突尼斯经济和统筹部，2016 年，http://www.mdici.gov.tn/wp-content/uploads/2017/06/Volume_Regional.pdf, accessed January 22, 2025.

义逻辑。一方面，复兴运动以其伊斯兰背景吸引宗教保守派与部分乡村基层选民；另一方面，呼声党则依赖世俗主义者、中产阶级与城市选民的支持。意识形态的深刻对立使联合政府在政策制定与落实过程中效率低下，在经济改革中频频妥协，导致政策无法触及问题根源，进一步加剧社会对政府的失望。这种意识形态斗争常伴随民粹主义的煽动性话语，各党派在选举中以代表人民利益自居，指责对手背离民众利益，从而制造政治对立。由于意识形态分歧、政党内部管理失范，以及为了争夺政治主导权，突尼斯政党政治的发展并不顺利，政策制定和落地过程低效，政治共识难以凝聚等问题使突尼斯政治展现出反复性、波动性和无序性等特点。民调显示，2019 年突尼斯民众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信任度仅为 20%，较 2011 年本·阿里下台后骤降了 42%。^① 效仿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并未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顽疾，财富分配不公、购买力下降、失业率走高、社会共识缺失等问题仍困扰着整个国家。在此背景下，曾经被民粹主义激发的普遍怨恨所推翻的强政府、强领袖模式反而成为民众怀念的对象。这种怀旧情绪并非偶然，而是民粹主义逻辑在治理失效背景下的再生产。当选举与民主制度无法带来经济社会发展，部分民众转而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或政党能够弥合政治分歧、恢复秩序。这种怀旧情绪为政治强人提供了心理基础和社会土壤，使强人政治在突尼斯政治语境下得到强化，最终促成了赛义德总统上台。

（四）凯斯·赛义德时期威权回归的民粹特点

凯斯·赛义德在 2024 年以高支持率、低投票率的方式成功连任。这一现象揭示了突尼斯政治生态的深层矛盾：民众对传统政治精英和政党体系的普遍不满转化为对强领袖模式的依赖和期待。这种政治选择与 2019 年总统选举中赛义德的胜选一脉相承。在 2019 年选举中，赛义德作为一名政治素人，以反腐败、反精英、恢复人民主权为核心的民粹主义形象成功吸引了广大选民。他的口号“人民想要并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深刻迎合了突尼斯民众对传统政治建制的失望和对革命成果遭窃取的愤怒。这种民粹主义逻辑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在其执政期间得以全面体现。

通过强化个人权威回应人民意志。赛义德在执政后迅速采取一系列强化总统权力的行动，声称这些是对人民意志的直接回应。2021 年，他解散议会并辞退总理，以应对政治僵局和治理失灵。赛义德认为，现行的多党民主体系已沦为政

^① 《阿拉伯地区的治理：专家探讨如何应对新冠疫情》（阿拉伯文），布鲁金斯学会，2020 年 9 月 3 日，<https://www.brookings.edu/ar/opinions/الحوكمة-في-المنطقة-العربية-الخبراء-ين>, accessed March 1, 2025。

党牟取私利的工具，无法有效反映人民的真实需求。^① 此后，他通过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巩固了总统在行政和军队中的绝对控制权。2022 年 7 月举行的公投显示，超过 90% 的选民支持新宪法草案。根据该宪法，总统可以在未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任命政府。这一集中化、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实际上削弱了分权制衡，强化了赛义德作为国家唯一合法权威的角色，这种治理模式正是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即以代言人民的名义超越现有制度和建制，建立领袖与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绕过中间机构的调和。

以反精英和反腐败为核心政治话语。赛义德的民粹主义逻辑在其反精英和反腐败的话语中表现尤为突出。他多次指责 2014 年宪法是政党精英私相授受的产物，导致革命成果遭到窃取。他批评传统政党只为自身利益服务，忽视底层民众的需求，并以此为由推出一系列反腐措施。这种对建制精英的批判，不仅帮助赛义德巩固了自身“人民捍卫者”的形象，也有效削弱了反对派的合法性。在 2021 年关闭议会时，赛义德公开指责议会中的政党是“腐败和瘫痪的代名词”。他通过这一举措将民众不满集中指向政党体系，而他本人则以改革者身份出现。这种反建制的政治逻辑正是民粹主义的重要表现：通过否定传统建制以强化“领袖—人民”之间的直接关系，构建一种绕过代议制度的权力行使方式。

以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为优先目标。在突尼斯面临经济危机、失业率高企、社会动荡的背景下，赛义德以维护公共秩序为由，将社会稳定置于西式民主制度之上。他主张通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国家干预政策，解决长期以来突尼斯社会经济改革的顽疾。这种政策选择迎合了突尼斯民众对强政府的需求，反映出民粹主义的另一特征，即以大众利益为名优先考虑短期见效的权威化治理模式。在经济政策上，赛义德推出一系列旨在缓解社会不满的短期措施，例如限制物价上涨、打击经济垄断和增加补贴。但是，这些政策缺乏长期规划和制度性支持，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短期红利稳定底层民众情绪，为其权威统治提供合法性支撑。这种政策偏好反映了民粹主义热衷于快速解决方案，而缺乏系统性改革的耐心。

构建“人民”与“敌人”的二元对立，进一步强化了民粹主义逻辑。在他的政治叙事中，人民是革命的主体和国家的真正主人，而反对派政党、部分媒体以及批评他的知识分子则被描绘成“人民意志的背叛者”和“革命的敌人”。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不仅帮助赛义德巩固了政治基础，还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异议。自执政以来，赛义德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并通过立法限制反对派活动。2023 年，突尼斯通过一项新法案，严格限制针对总统及政府的公开批评。这些

① [突尼斯] 阿卜杜勒·拉蒂夫·哈尔玛希：《突尼斯革命与苦难——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分析》（阿拉伯文），突尼斯索图传媒发行与出版公司 2023 年版，第 118 页。

措施虽然以维护国家稳定为由，但实质上是为了强化对人民叙事的垄断，消除对赛义德执政合法性的质疑。

赛义德一系列扩大领袖权力、构建个人权威、反对现有建制的政治实践，本质上是对平民诉求的直接回应。他试图重建中心化和集权化的国家治理模式，超越各政党分散的利益表达，构筑强大的国家集体意志，避免因盲目效仿部分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改革而再度出现秩序坍塌与社会分裂。在这一过程中，以代言人民、表达人民、捍卫人民为核心话语的民粹主义，再度成为维护公共意志、提供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武器。^①

赛义德的民粹主义治理模式既是对突尼斯政党政治失效的反应，也是民众对强人政治期待的体现。它标志着突尼斯在经历了“茉莉花革命”和政党政治实验后，再次回到一种“威权—民粹”的混合体制。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突尼斯民主转型的曲折，也说明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逻辑，可以在不同政治背景下被不同政治力量所利用，既可以作为打破威权的工具，也可以成为重建威权的手段。

世俗者与教民：民粹主义的宗教逻辑

在突尼斯的政治实践中，伊斯兰教为民粹主义提供了独特的宗教维度。作为一个穆斯林占绝对大多数的社会，突尼斯的民粹主义呈现出鲜明的宗教色彩，既体现在世俗政权对伊斯兰符号的政治化运用，也表现在政治伊斯兰势力的民粹动员策略中。这种宗教逻辑通过政治神圣化和宗教政治化两个维度展开：前者是世俗统治者借助宗教权威强化政权合法性；后者是宗教势力利用民粹话语进行社会动员。从布尔吉巴时期的国教确立到复兴运动的政治参与，再到萨拉菲主义的极端表达，突尼斯的宗教民粹主义实践揭示了伊斯兰教如何成为不同政治力量争夺“人民”定义权的重要资源。

（一）伊斯兰特色的民粹政治

在突尼斯的国情和伊斯兰教背景下，民粹的宗教逻辑主要体现在政治神圣化和宗教政治化两个维度。政治神圣化是指将世俗权力合法性提升到神圣高度的过程，主要通过运用宗教语言与象征赋予权力以神圣性。领袖权威的神圣化是该过程在威权体制下的重要表现。政治神圣化主要通过三种机制实现：首先是宗教赋

^① 刘辰：《民粹主义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第133页。

权，威权领袖通过强调自身在宗教解读方面的权威，将个人形象塑造成宗教和道德的象征；其次是宗教仪式政治化，领袖通过参与宗教仪式，进一步强化国家凝聚力和政权合法性；最后是文化整合功能，宗教凭借其文化和伦理功能，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强化道德约束和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①此外，世俗政权在利用宗教资源巩固自身权力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宗教改革等方式实现对宗教事务的全面控制，规避宗教民粹可能带来的治理挑战，避免宗教势力挑战世俗统治。^②

宗教政治化表现为将宗教从精神领域转化为权力斗争和社会动员的工具。宗教民粹动员是这一过程的核心体现，通过强调底层教民的道德优势和神圣身份，宗教民粹势力利用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引导他们对现有权力结构进行反抗。宗教民粹的话语常常塑造受害者身份，将治理问题归咎于世俗化、西方化以及精英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以此吸引被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③作为一种社会整合手段，宗教通过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填补底层群体的心理需求，弥合社会阶层裂痕。同时，民粹主义与宗教价值结合，通过复兴传统价值和对抗外来世俗化模式，进一步巩固其社会基础。在某些情况下，宗教极端主义与民粹主义形成合流，极端宗教势力借助民粹动员策略，强调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和正统性，拒绝多元化和西方式民主制度，通过暴力与激进手段吸引社会底层群体，并以宗教为工具强化反建制的动员能力。

从理论逻辑来看，政治神圣化与宗教政治化构成民粹主义宗教逻辑的两个核心维度。在突尼斯，民粹主义宗教逻辑既体现为国家建构过程中世俗政权对伊斯兰教身份的强调以及基于穆斯林身份的国民身份建构，也表现为政治伊斯兰势力通过强化宗教民粹叙事，利用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来实现反世俗化、反西方化诉求。这种民粹话语与宗教动员的结合主要表现为短期性和不稳定性，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一方面，宗教民粹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动员底层民众，表达对现有秩序的不满；另一方面，其缺乏系统性的治理方案和长远的发展规划，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容易在执政后遭遇合法性危机。

（二）国家建构中基于教民的国民认同构建

独立后，布尔吉巴在民族解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建立威权制民族国家，并确

① Bennett Lance, "Political Sanctification: The Civil Religion and American Politic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14, 1975, pp. 102 - 179.

② Jocelyne Cesari, *The Awakening of Muslim Democracy: Religion, Modernity,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5 - 6.

③ 李向平：《“神权民主”与“新国家主义”——当代国际政治中的“民粹宗教”》，《国际政治研究》2017 年第 5 期，第 66 页。

立官方伊斯兰为国教，将其写入宪法，使宗教成为威权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以及规训人民、强化民众对领袖忠诚和增强国家凝聚力的工具。这一安排体现了以宗教为基础构建国民身份的典型策略，即通过共同的宗教认同加强民众的国家归属感和政权认同感。布尔吉巴对宗教事务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包括将宗教集团的土地和资金收归国有，削弱宗教势力的经济权力；废除伊斯兰宗教法庭，剥夺宗教势力的司法权；将宗教教育机构纳入公共教育体系。这些改革使宗教势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只能局限于文化思想领域，从而避免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和民粹思想结合成为侵蚀领袖统治根基的力量。

在通过上述改革规避宗教与民粹相结合对政权稳定产生破坏性影响的同时，突尼斯历任领导人都积极调用伊斯兰因素建立领袖权威，使之成为赋予领袖宗教维度神权特征的工具，服务于这些非民主政治精英开展政治动员。^① 例如，布尔吉巴执政后，多次强调自身在解读和宣讲宗教精神方面的权威性，鼓励民众灵活对待和实践斋戒、开斋、礼拜等宗教习俗和仪式，强调宗教应为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服务。这种对宗教的革新性解读既显示领袖的宗教智慧，也塑造其为国家现代化而引导宗教变革的形象。1988年，本·阿里上台后立刻前往圣地麦加朝觐，并要求突尼斯电台恢复每日礼拜广播，以彰显自己对宗教事业的重视。^② 通过这些象征性行动，他迅速确立自己作为虔诚穆斯林领袖的形象，与前任建立差异化的政治认同。赛义德将自己参选和就职总统称为“真主所设之考验”，宣称“驱动他的并不是个人野心，而是宗教义务，将权力还给突尼斯人民”。^③ 这种宗教叙事赋予其政治行动以超越世俗的道德使命感，强化其作为人民代言人的神圣性。

赛义德执政后，多次强调伊斯兰教在传承民族文化遗产、维护社会伦理道德、广泛团结民众等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并出席多场宗教仪式，为前往伊斯兰教圣地朝觐的穆斯林送行，以此彰显自身对弘扬国家传统文化，捍卫民众宗教信仰的重视，这些行动进一步巩固其作为宗教和民族传统守护者的形象。同时，赛义德加大对宗教极端分子的打击力度，呼吁推动宗教改革，力主在国家新宪法中删除伊斯兰教是国教的条款，强化政教分离，避免宗教势力利用极端化的民粹情绪削弱世俗政权的执政合法性，避免加剧官民对立，恶化政治生态，重蹈

① [巴勒斯坦] 阿兹米·巴沙拉：《对于疑问的回应：何为民粹》（阿拉伯文），卡塔尔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 2019 年，第 9 页。

② [英] 肯尼斯·帕金斯：《突尼斯史》，第 196 页。

③ Vivian Yee, “Populist Hero or Demagogue: Who Is Tunisia’s President?” *New York Times*, 2021-9-27, <https://www.nytimes.com/2021/08/26/world/middleeast/tunisia-president-kais-saied.html>, accessed March 5, 2025.

“茉莉花革命”的覆辙。

作为突尼斯社会的重要文化底色，伊斯兰教在社会各层面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与调节作用，为政权合法性和政策合理性提供神学基础和法理解释，推动构建具有适应性和包容性的社会关系。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伊斯兰教一旦被民粹主义劫持，将迎合大量社会弱势群体的反抗心理，成为威胁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最大因素，并可能导致多元化政治改革进程失败和针对世俗政权的仇视情绪集中爆发。因此，如何促进宗教与世俗和谐共存，发挥宗教教化和引导民众的积极作用，避免宗教与民粹合流，一直是突尼斯实现国家良治，建设多元民主社会的核心关切。

（三）政治伊斯兰的民粹动员和反抗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随着布尔吉巴威权体制日益僵化，政治伊斯兰思潮在突尼斯逐渐抬头。这一思潮批判世俗威权制度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带有深刻的西方印记，认为其违背伊斯兰教“圣俗一统、政教合一”^①的历史传统，并将国家的政治腐败和治理失效归咎于脱离伊斯兰传统的世俗化进程。

在地区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下，突尼斯国内部分宗教团体开始涉足政治领域，组建政党并致力于实现突尼斯式的伊斯兰复兴。他们试图从民粹思想中获取动员力量，以重建和复兴伊斯兰传统价值为名，推动对现有制度的革新乃至颠覆。1981 年，“伊斯兰倾向运动”组织成立，提出反西式现代化、反世俗化、反西方世界的政治诉求，并坚持通过民主政治路线参与国家治理，谋求合法政治地位。该组织创始人拉希德·加努希认为，伊斯兰是突尼斯的唯一出路，基于伊斯兰价值建立多元化的民主社会是解决国家发展问题的最佳方案。^②在该运动的政治主张和实践中，复兴伊斯兰传统，以伊斯兰精神净化社会风气和政治生态，缩小社会阶级间发展和财富鸿沟，从而实现政治层面的全民民主和经济层面的公平正义。这一理念与民粹思想反对建制派精英和独裁统治，修正政治民主缺失、社会财富垄断以及传统价值覆灭的诉求高度契合。民粹主义与政治伊斯兰结合的社会基础在于两个群体的身份重叠：一方面是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与经济权利被剥夺的广大底层民众；另一方面是身处异于伊斯兰传统的西方式、世俗化社会环境中的穆斯林群体。这两个群体在持续加剧的贫困与不平等中被不断推向社会边缘。特别是在突尼斯威权统治的政治生态下，当这些群体无法认同并有效参与常规政治时，容易通过抗议或暴动等形式释放出破坏性巨大的能量。^③

① 刘中民：《中东政治专题研究》，时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8 页。

② 黄麟：《超越律法主义：拉希德·加努希政治思想探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95 页。

③ 林红：《不平等：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国外理论动态》2020 年第 3 期，第 193 页。

布尔吉巴在其执政后期对“伊斯兰倾向运动”等组织进行大肆镇压，导致世俗威权政府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关系紧张，冲突不断激化。1989年“伊斯兰倾向运动”更名为“复兴运动”，积极倡导多元主义，力图推动民主政治改革，凭借倡导不同性别、阶层、族裔间政治经济权利平等的理念，赢得更广泛社会基层民众的认可与支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本·阿里加大对复兴运动的打击力度，防止民众被宗教民粹的动员话语煽动，对其统治地位造成冲击。

2011年剧变爆发后，本·阿里时期的政治高压解除，以复兴运动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借助宗教外衣得以留存，并作为原有体制受害者而为人民所广泛同情，^①强势回归政坛，复兴运动与世俗政党成功组建联合政府。然而，与许多国家的民粹主义相似，突尼斯的民粹宗教思想在国家发展与治理方面同样面临困境：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方向模糊、发展战略缺失。相比于在国家层面设计和实践理性务实的发展规划，民粹宗教力量更擅长通过激发平民的宗教热情，甚至推动情绪宣泄来服务于选举政治，而无力在威权领袖下台后的弱政府阶段与中央权力真空时期有效解决经济与民生问题，进而阻碍社会共识的凝聚和资源的有效整合。^②联合政府的发展方案未能改善突尼斯社会经济状况，通胀率和失业率攀升导致民众对联合政府和政治伊斯兰势力的不满情绪增长。国内自2013年起爆发多次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最终导致其无法长期稳定执政，凸显民粹思想在与宗教融合后，作为一种短期性、煽动性策略或工具的局限性。^③

布尔吉巴执政末期，突尼斯国内经济社会矛盾集中爆发，萨拉菲主义者批评政府世俗化和西方化政策，得到底层民众支持。本·阿里时期，部分极端分子诉诸暴力手段，试图夺取政权，“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也导致“圣战”思想在国内青年群体中进一步蔓延。“茉莉花革命”后，圣战萨拉菲主义者不惜通过暗杀世俗政党领导人以及暴恐袭击等极端方式表达政治主张，吸引青年和社会底层群体。不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对于萨拉菲主义而言，伊斯兰教一直是其获取政治感召力的主要来源，也是引导民众排解集体焦虑，重建身份认同的有效路径。而民粹主义思想中对平民阶层民主、民生、民意等概念的关注，也丰富了萨拉菲主义身份政治的叙事内容，加大弱势群体的心理认同，强化其社会基础，使它能够持续积累道德和政治资本，在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时刻，激发民众政治热

① 田文林：《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2页。

② 马晓霖：《冷战后三十年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管窥》，《西亚非洲》2021年第5期，第18页。

③ 林红：《民粹主义全球性再现的根源：民众与政党的双重维度》，《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期，第95—103页。

情，再度成为掀起革命浪潮的力量。^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突尼斯政治发展历程中，复兴运动虽然利用民粹主义和宗教力量成功扩大政党影响力，并在一段时期内有效掌控了国家权力，但整体而言，该组织长期坚持国家的世俗性质，积极适应国家的政治环境，呈现出其较温和与灵活的意识形态。相较于主张促进伊斯兰传统与世俗政府融合、推动构建多元民主社会的温和政治伊斯兰力量，突尼斯的极端宗教主义者则体现出更激进的民粹宗教特点。

“圣战萨拉菲”强调国家主权归真主所有，反对现有选举制度，认为西式民主选举模式限制了穆斯林代表真主治理国家的权力，主张通过暴力反抗，建立反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的纯粹伊斯兰社会。与之不同，突尼斯萨拉菲主义者中也存在主张积极参政、温和处理与世俗民主体制关系的政治萨拉菲派别，他们拒绝通过暴力手段推动变革，而是坚持通过和平手段参与政治，在维护现有制度稳定的前提下开展基于伊斯兰价值的政治改革。^②但“圣战萨拉菲”主义者则坚持伊斯兰式方案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途径，强烈排斥民主和现代化思想，试图借助极端主义思想重塑突尼斯社会的国家观和人民观。他们认为，民族主义、世俗主义、自由主义导致穆斯林群体衰落与分化，而社会中处于被边缘化境地的弱势群体，正是那些具有坚定伊斯兰信仰，拥有道德优势和神圣身份的穆斯林平民。由此，民粹主义与极端化伊斯兰主义相互渗透，彼此激活，向社会底层“兜售受害者身份，把他们的不幸归咎于群外人，并引领他们要求界限清晰的尊严承认”^③。

结 论

通过对突尼斯政治发展历程的分析，本文揭示了民粹主义如何通过三重逻辑深刻影响非西方社会的政治变迁。这三重逻辑相互交织，共同塑造突尼斯独特的政治发展轨迹。在民族主义逻辑中，民粹主义既是解放工具又是政治资本。去殖民时期，布尔吉巴以人民为本的形象成功建立民族国家；独立后，政治精英不断通过民族认同的民粹叙事争取政治支持。这一过程揭示人民如何在民族建构中被政治化，成为动员的核心符号。在民主欠发逻辑下，民粹主义成为威权与民主之间的过渡性产物。布尔吉巴的魅力型领导、本·阿里的改革者形象，以及赛义德的“人民想要并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口号，体现威权领袖如何利用民粹话语维

① 刘辰：《民粹主义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第 136 页。

② 孙晓雯：《政治萨拉菲主义：思想、演进与困境》，《世界宗教研究》2019 年第 5 期，第 165 页。

③ [美] 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刘芳译，中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74 页。

持集权，同时回应民主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既是突破威权的工具，也是威权回归的桥梁，在突尼斯政治循环中扮演双重角色。在宗教逻辑中，民粹主义通过政治神圣化和宗教政治化两条路径发挥作用。一方面，世俗威权领导人调用宗教元素强化领袖权威；另一方面，政治伊斯兰力量借助宗教民粹主义动员底层民众反抗世俗精英。复兴运动与“圣战萨拉菲”的不同路径显示，宗教民粹主义可呈现温和与极端两种面向，导致截然不同的政治结果。

这三重逻辑在突尼斯政治发展中并非孤立运作，而是相互强化。在权力争夺过程中，不同政治力量都试图通过民粹主义垄断“人民”话语的定义权，从而建立政治合法性和动员能力。各政治力量对“人民”话语权的争夺构成突尼斯政治变迁的隐性动力，也折射出非西方社会民主转型的复杂性。突尼斯的实践揭示了民粹主义的内在局限性：它能够成功激发政治变革，却难以提供有效治理方案；擅长情绪动员，却缺乏解决结构性问题的能力；能够迅速赢得短期支持，却难以维持长期政治稳定。这种局限性导致突尼斯政治发展的周期性波动，使国家在民主尝试和威权回归之间反复摇摆。

突尼斯的案例对理解当前全球民粹主义浪潮具有重要启示。2025年，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全球民粹主义将迎来新一轮上升期。特朗普与赛义德尽管政治背景迥异，但是在民粹动员策略上具有深刻相似性：二者均通过否定传统精英、强调领袖与人民的直接联系、推崇强政府模式来获取和巩固权力。这表明，民粹主义逻辑具有跨文化的可通约性，能够在不同社会背景下被灵活运用。民粹主义的多样性、多源性和多向性要求我们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应对民粹主义浪潮不应简单采取抵制或全盘接受的态度，而应着眼于其背后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政治代表性缺失等根源问题，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包容性发展、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来减缓其破坏性影响，同时保留其作为社会矫正力量的积极意义。

在全球政治格局日趋复杂的今天，突尼斯的经验表明，理解非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必须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充分考虑本土历史文化因素与全球化互动形成的特殊政治逻辑。民粹主义三重逻辑的分析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丰富而立体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政治发展的多样化路径和非线性特征，从而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具包容性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智慧。通过突尼斯这种非西方典型案例解析民粹主义逻辑，有助于增进对民粹主义多样性的理解，促进国际社会重新思考应对民粹主义的方式，认识到民粹主义既可能是民主的矫正力量，也可能是威权的掩护工具；既可能推动社会包容，也可能加剧社会分裂。这种复杂性认识对于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政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贺杨）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Impact of Newspapers in British African Colonies

Li Pengtao

Abstract: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with the cultural infiltration of European missionary groups and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British colonial rule, newspapers emerged serving dual purposes of missionary work and consolidating colonial control,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journalism in British African colonies. By the 20th century, a new generation of African-educated elites began founding newspapers, transforming them into a significant force driving socio-cultural change in these colonies. These newspaper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shaping of Afric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indigenous African langua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frican literature. Faced with the increasingly vibrant African press, British colonial authorities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regulatory measures, including enacting press laws, cultivating pro-British propaganda outlets, and intensifying media censorship. However, these policies exhibited evident contradictions: colonial authorities sought to exploit newspapers as instruments of colonial control while simultaneously attempting to stif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frican press. These contradictions fully exposed the hypocrisy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authorities' so-called "freedom of the press" doctrine. Despite persistent colonial pressure, African journalists and readers retained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autonomy, enabling newspapers to evolve into a crucial front for the anti-colonial movement by the mid-20th century.

Keywords: British African colonies, African newspapers, anti-colonial struggle, African nationalism

Author: Li Pengtao, Researcher of the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The Threefold Logic of Populis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Tunisia

Liu Chen and Sun Fengxuan

Abstract: Employing a threefold populist logic framework,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ontes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people" in Tunisia from French colonial period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ransitions. The study identifies three interwoven dimensions of populist practice: The nationalist logic constructs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opposition between “colonizers and nationals”, evolving from a tool of national liberation during the Bourguiba era to a key asset for post – independence political elites competing for power. The logic of democratic underdevelopment manifest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lers and subjects” as a compromise between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cy. From Bourguiba’s charismatic leadership to Saied’s authoritarian resurgence, populism has consistently played a transitional and accommodative role. The religious logic, characterized by the division between “secularists and believers”, reveals a dual process of political sacralization and religious politicization: while secular regimes invoke Islamic symbols to reinforce their legitimacy, political Islamist forces mobilize religious populism to challenge the secular elite. The study finds that populism in Tunisian political practice is marked by apparent instrumentalism; various political actors strive to define “the people” in ways that shape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their favor. This dynamic constitutes a driving force of Tunisia’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reflecting the intricacie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in non – Western societies. At the same time, populism reveals intrinsic limitations: while effective in sparking political change and emotional mobilization, it struggles to provide sustainable governance solutions. The Tunisian case illustrates the diversity, multiplicity, and multidirectionality of populism, offering a perspective that transcends Western – centrism and providing critical insights into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amid the ongoing global populist wave.

Keywords: Tunisia, populism, nationalism, democratic transi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uthors: Liu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Arabic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Sun Fengxuan, PhD Candidate of the School of Arabic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Morocco’s Clean Energy Diplomacy: Motivations, Pathways and Challenges

Zhao Yuechen and Jiang Wenji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lean energy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shown a collective rise. Morocco has strategically leveraged clean energy diplomacy as a strategic lever to respond to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initiatives and pursue geopolitical interests externally, as well as a green engine to strengthen domestic energy security and